

法哲学学术译丛

全球化·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

李义天◎编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Marxism



人民出版社

海外借

全球化·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

李义天◎编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Marxism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李义天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0
(法哲学学术译丛)

ISBN 978-7-01-021114-5

I. ①全… II. ①李… III. ①全球化-研究②政治哲学-研究③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C913②D0-02③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58760 号

全球化·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

QUANQIUHUA ZHENGZHIZHIXUE MAKESIZHUYI

李义天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7-01-021114-5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言 我们时代的思想片断

李义天

——

每一位勤于思考的研究者以及每一位有所思考的普通人,都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自己在这个时代中所处的位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或者说我们,总希望可以准确地理解这个时代,把握它的特征、内涵与走向。这项工作对研究者来说是“使命”,而对普通人来说则近乎“本能”。

之所以说“使命”,是因为无论从知识生产的规范性来讲,还是从知识本身的内在诉求来讲,研究者都必须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层面上对时代的状况和趋势予以判断。这种判断往往表现为具有提炼性、概括性的命题。尽管由于学科体系的划分,研究者常常只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从一个侧面切入,尽管由于学术规范的严谨,研究者不能停留于提纲挈领的语录而必须提供详尽的论证,但是,无论从哪个侧面切入,也无论展开怎样的论证,研究者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却必须始终抱有一种关于时代的“顶层设计”与整体关怀,必须从他们的研究和论证中得出一种有关时代之基本面的综合性判断。唯有如此,研究者的学术实践才不会失之于琐碎的技术分析,他们孜孜以求的“细节”才不会沦落为意义浅薄的“末节”,而他们所阅读和钻研的海量文献,也才不会变成使之沉迷或得意但实际上却与时代状况相隔绝的东西。

受到现实的激发,直面时代的困惑,进而作出严谨的回答,这样的学术研究无疑令人尊重。即便是历史研究中那些看上去与当下时代鲜有关联的部分,也只会因为它们恰当地展现了另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或精神格局而令人向往。进一步地,假如它们所展示的那个时代还能给我们的这个时代带来什么启示或启

发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仅是在复原那个时代,而且是在建构我们的时代,因而只会更加令人肃然起敬。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去探究和发现与这个时代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知识,这对研究者来说即便不是唯一重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说普通民众,他们可能缺乏专门的学术训练与分析工具能够帮助他们作出像研究者一样专业的判断,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对自己的时代以及自身的位置有所把握的热情却不亚于任何人。面对一个时代,他们不会提出那么有学理性的问题,但他们却会生出极具个性情怀的感慨;他们无法给出那么概括、深刻、融贯的回答——甚至可能恰恰相反,只是一些粗糙、表层或矛盾的回答——但他们的判断却往往会因为基于直觉或直观而呈现出更为鲜活的内容与形式。

他们之所以关心“时代”这样的“大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时代对他们来说构成了生活的背景与框架,对时代的洞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个人的生活计划。几乎所有人相信,要过上一种惬意与体面的美好生活,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这个时代;只有把握了时代的特征与趋势,并将自己的生活计划按时代的主流来设计,使之合乎时代的历史要求和道德要求,他们才能实现这一点。如果面对时代的背景缺乏理解与反思,面对社会的发展缺少观察与思考,那么,个人的生活计划将遭遇更大的碰壁风险。

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宏大的时代,微小的个人只能报以顺应乃至屈服的姿态呢?当然不是。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即便是那些对自身时代及其主流予以批判的人,也并没有否认时代整体与个人生活之间的上述关系。毋宁说,他们通过政治批判或道德批判所表达的,乃是对于当前时代与一种被认为更加合理的生活计划之间紧张关系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现有的时代及其主流精神已经腐化堕落,失败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程度;而他们所希望的,则不过是改造乃至重构一个新的时代,用新的替代方案来容纳他们所向往的生活计划。这样,不仅个体的生活计划将会因为顺应了新的时代而被证明为正当的,而且,新的时代本身也会因为尊重了他们的生活计划而被证明为合理的。所以,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个体都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小日子”,也得关注身边的“大时代”。

对时代给予关注似乎是容易的,但是,对时代作出判断却是不容易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始终身处时代之中。我们与我们的时代之间不仅存在一种生存论上的循环,也存在一种解释学上的循环;我们无法也不可能跳到我们的时代之外进行纯粹客观的打量。同样地,对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不管是把人类的过去断定为“黄金时代”或“黑暗时代”,还是把人类的未来命名为“大同时代”或“末日时代”,这些都只是人类从我们的时代出发而进行的观察甚至设想。因

此,在最苛刻的意义上,我们并不能对我们的时代在整个历史中的位置给出精准的界定,也不能对我们的时代与其他时代之间孰优孰劣给出无需修正的断言。面对狄更斯的那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的名言,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客观的判断。我们之所以会对此津津乐道,而且常常加以援引,用来描述我们的时代境遇,更多地是因为与其他的时代相比,我们只有对我们的时代才有着更强烈、更丰富的切身感受。我们可以追溯前人的喜与悲,可以设想后人的苦与乐,但是,它们远远不及当这些东西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时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时所带来的那种触动、冲击与震撼。当然,从纯技术的角度,我们的知识足以告诉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处于最好的时代,而在哪些方面我们又处于最坏的时代。可是,对我们的生存而言,根本的问题却不在于此,而在于,无论我们的时代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最智慧的还是最愚蠢的,我们所拥有的都只是这个唯一的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交往,在这里发问和思考。一切都要从这里出发。

二

不管怎样定义我们的时代,毫无疑问,有一种相对宽泛但意义丰富的称呼是可以被接受的——“现代”。与公元4世纪的拉丁作家创造“modernus”一词时用以专指“当前”的基督教时代从而区别于“过去”的古罗马时代不同,我们所使用的“现代”不仅特指17—18世纪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以来的“当前”文明阶段,更重要的是,它强烈地意味着与任何“过去”的转折甚至断裂。换言之,我们这个时代从一开始就是以自身不同于以往的独树一帜,而不是以自身承续着过去的源远流长来实现自我证明的;它所追求的恰恰是“不太一样”甚或“绝不一样”,而不是“基本一样”,更不是“完全一样”。

现代社会自觉地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时代。而它用以塑造自身的一个方案就是,承认并鼓励自身内部的多样性呈现。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普遍注意并且相信,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尤其是这些因素在伦理层面的多样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便不是最本质的、也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研究者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较大而且异质性的共同体之中,在道德观念和‘良善生活’的观念方面,存在深刻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对于道德、价值、善以及生活的意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谈论得越多,我们就越可能发生分歧,哪怕我们都是理性的人。用拉莫尔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合理的分歧’

(reasonable disagreement)。在现代社会中,似乎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但同样正当、同样合理的善的观念,这构成了现代性的特征性条件。”^①虽然这种描述常常作为某种特定的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立场的事实预设,但这绝不意味着其他的立场就会否定该事实。毋宁说,关于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多样性的事实,乃是所有现代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都必须也必然承认的经验前提;只不过,相对于诸如社群主义或社会主义等立场,自由主义的多样性诉求似乎显得更为敏感、持久和融贯,它没有在其理论环节中设置任何有可能消解或取代多样性的东西。

然而,多样性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事实吗?从人类文明的历程来看,各文明族群一开始本来就是在不同区域内分散地发展起来的,我们自始至终也从未听说过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哪一种思想观念真的在全世界实现了“一统天下”格局,即便在同一个文明族群内部,与主流不尽相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从未彻底消失。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说,多样性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吗?它又何以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多样性诚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但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多样性的表征方式、呈现通道及其聚集平台才得以最大限度地展开。全球化与公共领域的兴起,正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方式。

所谓全球化,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指人员交通、信息交流、物资交换的全球通行。但是,仅有这些尚不足以断言全球化的到来。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中国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15—16世纪的欧洲大航海探险等零星的跨国活动当做“全球化”成熟的标志。甚至,即便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世界市场与贸易体系的初步建立、电话电报等传播工具的发明应用等事件,也不足以称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因为,真正的“全球化”不仅要求人员、物资和信息的互动,而且要求一种高频率、高效率和高密度的互动。形象地说,一种真正的“全球化”要求的是人员“说走就走”,物资“择日可至”,信息“转瞬即达”。只有当人员、物资和信息的全球互动呈现出这样的随时性和即时性,我们的生活才会身处一地而又同时面向所有地方展开:我们进行任何重要的思考,都必须考虑到来自全球范围的数量庞大的信息背景;我们进行任何重大的决策,都必须顾及到它们在极短时间内所会导致的世界影响。我们虽然身处一地,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却时刻面对各种信息和资源的输入。这些因素迅速地、大量地被带到我们面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在没有这些因素的条件下所可能作出的思考和决定。同样

^① 刘擎:《纷争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地,我们的思考和决定也经由这股浪潮而随时在瞬间便被输出到一个更广泛的空间。

的确,在全球化到来之前,世界各地本就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但是,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将这些多样性带到我们面前,将“所有地方”呈现在“每个地方”,让每个地方都不得不在思维中稳定地持有一幅关于多元选项与多元可能的画面。这样,我们不仅从整个世界的角度能够得出“多样性”的结论,而且从局部世界的角度也能够得出“多样性”的结论。其实,全球化并没有拉近人们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但是,交通运输工具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却使得这种距离能够随时被“消灭”,而不再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将“时空”忽略不计的时代。它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时刻与来自世界层面的多样性共生共存。

为了多样性的持续存在,尤其是思想观念多样性的持续存在,我们不仅需要“全球化”这一有关多样性的生产机制,而且需要“公共领域”这一有关多样性的容纳机制。没有后者,前者所生产的多样性就无法落地生根。

所谓公共领域,在宽泛的意义上,是指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超出了私人性的家庭生活之后所接触和参与的公共空间;而较严格地说,它则是人们就政治与道德等方面的重要公共议题与公共事务进行交流、辩论和决定的公共空间。因此,公共领域的兴起本身就是多样性尤其是思想观念的多样性促成的;公共领域的内在诉求就是形成“自由的舆论能够产生的土壤”^①,以便容纳与融合多样性,为它们提供聚集和表现的平台;公共领域的稳定与否,将表征并影响着社会的多样性状况。

从世界历史来看,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其阻力既有来自社会上层权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也有来自私人领域的懈怠。一方面,缺乏公共辩论的前现代国家自然谈不上有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存在;而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对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有心无力或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体,也会因为冷漠或胆怯而不愿意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建构中来。前者必然无助于思想观念的多样性,而后者即便有所公开表达,也充满虚假、毫无个性。

公共领域的兴起需要对上层权力进行约束,而公共领域的兴起本身又构成了约束上层权力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一条发展主线。无论是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美国的独立战争,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

① 【德】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梁光严译,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民主主义革命,尽管面临的具体挑战与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在改造以至于推翻一种不受约束的上层权力,从而建立起一种与之前相比更为自由解放的公共空间,允许更多的社会成员支配财富、表达意见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意义上,它们却有着相通之处。就此而言,现代社会的建立,就是要让现实中“本来”存在的多样性变成“理应”存在的东西,而公共领域的使命就在于实现并满足上述诉求。毋宁说,一个社会,从其权威精英到普通民众,是否具备了“公共领域”的意识观念,是否设置了“公共领域”的保障与促进机制,是否承认并且释放出蕴藏在社会成员之中的多样性,将成为该社会是否堪称“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尺度。

我们可以说,虽然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但只有当我们的时代真正步入了的全球化进程,这种多样性才得到承认;同样地,虽然人类社会一直存在思想观念的多样性,但只有当我们的时代真正形成了公共领域,思想观念的多样性才得到尊重和鼓励。

三

全球化的深入与公共领域的兴起不仅呼唤着思考公共问题的思想观念,而且鼓励和刺激着此类思想观念的发展。这正是政治哲学以及道德哲学中有关公共事务的讨论在当前凸显的基本原因。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部,公共生活已成为我们全部生活的重要甚至主要维度,而且在不同国家之间,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也使得我们一方面要把以往单纯针对国内事务的考察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另一方面还要专门针对全球层面的问题本身展开讨论。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必定会大量接触到当前西方学界的资源。

然而,同样是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界尤其是汉语学界的特殊地位,而且因为,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左翼思想阵营对当前全球化与公共领域之展开方式和运行方式的有力批判。更重要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之际,在公共领域中涌现出来的一种至今仍在诸多方面具备强大解释力与吸引力的现代意识形态。它也许在当前西方学界并未占据主流,但对于中国乃至对于世界的未来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分析法,认为在讨论任何人类社会问题时,都不能抽象地讨论“所有人”如何,更不能抽象地讨论“人”如何。因为,社会是由不同的阶级或集团构成的,现实利益的实际差异性导致不可

能存在一个共同的“所有人”或者抽象的“人”，而只可能存在“这群人”或“那群人”。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长在于辨析“对这群人而言如何”、“对那群人而言又如何”，但却不能对全球化时代中那些涉及“所有人”的普遍问题提供分析与回应。

可是，一个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脱胎而来的思想者会彻底地放弃这种自希腊时代开始、而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达到顶峰的普遍主义的知识诉求，放弃针对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判断，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毕竟，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扩张的时期。其间，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我繁殖和复制使人仿佛不得不承认，一种全球主义的世界图像（及其相应的思想图像）完全可以实现。更何况，马克思自己也说，人类的未来必然要实现这样一个无国别的整体性的人类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条件”。所以，指认马克思仅仅拘泥于特殊主义的知识立场，这似乎过于简单。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摒弃资产阶级在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全称命题，另一方面又确立自己的全称命题；他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所说的“所有人/全人类”是抽象的，另一方面又依然落脚于“所有人/全人类”的社会理想之上。

这里的关键也许在于引入“时间”的维度。作为一位现代的思想者，作为一个仍然坚信真理存在并且真理应当以一种为每个人所共享的方式存在的思想者，马克思不可能不把自己的学说表述为某种全称命题。但是，这种全称命题所指代的内容，却不是在当下（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现代社会）实现，而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马克思不仅相信，这一事关“所有人”福祉的美好生活模式必将实现，而且他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论证，就在于为这一美好生活模式的发展和实现探寻科学的路径与方法。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异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真正地不再存在人与人的隔阂。但是，这种“无阶级”的无差别状况，是绝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自身就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基础上，它至少需要两个利益集团或阶级才能自我构成。因此，当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或阐释者在那里大谈“每个人/所有人”时，马克思只是想拆穿他们的虚伪性。因为他们虚伪地欺骗大众说“我们是一家人”，但马克思说“不是，至少目前不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马克思批判的学说的关键错误并不在于它们是普遍主义的，而在于它们把属于未来的普遍状况偷梁换柱地搬到仍然充斥着隔阂

与对立的现代现实中来。因而,那些遭到马克思批判的人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搞错了事实,而在于他们隐瞒了事实。

马克思并不是不想实现一种普遍的美好生活图像,也不是不想表达一种共同的思想命题。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更看重的是,要通过经济的变革和政治的革命,现实地而非思辨地消灭阶级的关系,取消阶级的对立,从而达到一种基于共同经济基础的社会关联。在这种被称作共产主义的社会关联中,人与人之间是利益无差别、无冲突的,因而可以名副其实地陈述关于“所有人/每个人”的全称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既根基于现代性的问题和观念土壤,更超越于现代性自身所可能提供的所有方案。马克思主义既在现代性之中,又在现代性之外;它通过不断地保持和运用自身面向现代性的批判力量,为人类的未来指明着方向。

四

基于上述考虑,当我们试图以对话与访谈的形式来编撰一部大致反映时代状况及其思考的文集时,“多元的全球化时代”、“公共生活与政治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便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自2008年以来,我们邀请了志同道合的学界朋友,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出发,就我们这个时代的若干重大前沿与热点话题,同目前相关领域中最为活跃的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进行了对话交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真实性、丰富性和现场感,所有的对话均是经过长期的酝酿设计、利用多种机会与场合“面对面”进行的。其中,有些是国外学者来华访问期间同国内学人交流的记录,有些则是国内学者在国外访学期间与他们专门约定时间进行讨论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对话双方或各方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对等式的“交流”,而不是媒体式的“采访”。尽管对话仍以知名学者的表述为主,但是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们的看法也同样坦率和敏锐。

关于时代的话题总是宏大的,而学者们涉及时代的思考也往往以长篇大论示人。因此,以对话体呈现出来的思考,也许尚不能说是“时代的思想”,但仍称得上是“时代的思想片断”——只要这些片断确实反映了我们的这个时代。幸运的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些对话嘉宾,除了在同我们的交流中提供了“思想的片断”,他们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也早已将他们关于时代的系统思考付之于多部重量级的作品了。从编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这些“思想的片断”只是一个契机或诱因,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线索,使之进一步阅读那些体现了他们更深入思考

的文本,进一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本身。

文集中的篇章大多曾刊登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受到学界前辈和同仁的认可,引起广泛的影响;而在收录到本文集之前,又再次经过各位作者的修订。虽然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部分作者的工作单位或身份乃至具体观点发生了变化,但为了保持当时访谈的原有情境,呈现甚至检验当时访谈内容的思想穿透性,我们对此未作改变。在此,要感谢所有参与创作这些对话的朋友们,我们之间的反复沟通、修改与交流无疑是一段段弥足珍贵的记忆;感谢人民出版社的洪琼编审为本书的最终出版进而能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

目 录

前言 我们时代的思想片断

李义天/ 1

I. 多元的全球化时代

民主、全球化与历史的未来

【美】弗朗西斯·福山 李义天 薛晓源 陈家刚/ 3

全球正义的困境与出路

【美】理查德·米勒 陈文娟/ 13

多元立场、公民身份与全球视野【加】威尔·金里卡 卞绍斌/ 31

中国的政治改革、国际环境及未来

【美】李成 闫健/ 47

II. 公共生活与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研究：历史、现在与未来

万俊人 李义天/ 59

现代社会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

钱永祥 张容南/ 74

公民共和主义：理解与辩护

【美】迈克尔·桑德尔 朱慧玲/ 90

免于支配的自由与公民共和主义的理想

【澳】菲利普·佩蒂特 张曦/ 107

III. 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文本语境

【美】诺曼·莱文 臧峰宇/ 121

概念的革命和革命的概念 【美】迈克尔·哈特 秦兰珺/ 131

和谐的愿景与去殖民化的世界想象

【美】沃尔特·米格诺罗 何卫华 谢海燕/ 149

马克思、启蒙思想与生态批判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美】萨莎·利利/ 166

I. 多元的全球化时代

民主、全球化与历史的未来^{*}

【美】弗朗西斯·福山 李义天 薛晓源 陈家刚

2010年12月15日,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访问中央编译局并做客“中央编译局论坛”,详细阐释了他对西方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理解。论坛结束后,李义天博士、薛晓源博士、陈家刚博士就“民主、全球化与历史的未来”这一主题与福山教授进行了深入对话。福山阐述了他对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探讨了该制度背景下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并对他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和历史变迁的社会心理机制等观点所遭遇的批评进行了回应。

一、社群文化与政治信任

李义天:福山教授,您好!欢迎您到访中央编译局与我们交流。我们知道,你接受过许多类似的访谈,人们向你询问的往往是些“大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让我们的交流从一些“小问题”开始吧。首先,作为一名在美国出生成长的日本后裔,您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人文学者?在这方面,你的家庭带给你哪些影响?

福山:我的家族中有很多学者。我的外祖父其实就是一位杰出的日本经济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留学德国,他帮助建立京都大学的经济学系,并且担任过大阪市立大学的校长,一生出版过五十多本著作。刚才参观你们的马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义天,时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薛晓源,时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家刚,时任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